

諮商師和通譯員在心理諮商中的合作

黃進南* 郭世婷

摘要

本文主要探討諮商師和通譯員在心理諮商中的合作議題，藉由文獻資料的整理，針對台灣諮商師使用通譯員提供外籍勞工和新移民心理諮商服務時，應有的認識和注意事項，並期待國內諮商輔導訓練機構和學術機構能夠關切此議題。本文內容包括：通譯員在心理諮商中的重要性、諮商師、當事人和通譯員的三角關係、通譯員的身份與訓練、諮商師和通譯員在心理諮商的合作等議題。

關鍵詞：諮商師、通譯員、合作

黃進南* 和春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jinnan@center.fotech.edu.tw)
郭世婷 屏東教育大學教育心理暨輔導學系研究生

壹、前言

過去傳統且大部份的個別諮商模式，皆為一對諮商師和個案在一個隱密、安全且溫暖的空間，雙方主要使用共通的語言來進行會談，而且國內大多數的諮商實務工作情境也都是如此，諮商輔導研究所的課程和教育訓練方式，亦以單一諮商師、單一當事人來進行學習，鮮少有通譯員（interpreters）出現在諮商過程中並與諮商師進行合作，對此方面的瞭解和訓練相對減少。研究者在臺灣多年的諮商實務工作，偶然有一次機會必須運用通譯員的協助翻譯進行諮商，在這個過程中有了一些寶貴經驗和反思，進而蒐集相關的文獻資料及閱讀，並期待透過此文章的拋磚引玉，引起實務界和學術界對於此議題的關切與重視。

貳、通譯員在心理諮商中的重要性

在歐美國家，通譯員大多出現在學校教育體制或難（移）民的情境，以協助雙方能夠順利進行溝通，以解決學生或難（移）民的需要和困難。根據美國教育部門 2006 年的統計，發現在學校教育體制中已近有 10% 非美國籍學生在進行英文學習（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ELLs; Paone & Malott, 2008）。但是，非常少的心理衛生工作者具有另一種語言技能來提供專業服務給進行 ELLs 的當事人，另外，參加 ELLs 的學生也很難順利使用心理衛生的專業服務，而且亦不信任心理衛生機構可以在語言溝通上提供協助。Kline、Acosta、Austin 和 Johnson (1980) 比較在心理諮商服務中有無通譯員的當事人，他們對諮商服務的感受，研究結果發現：有通譯員的當事人在問卷上的回答，表示諮商是有幫助的；沒有通譯員的當事人則表示在諮商過程中，較少得到愉悅的（pleased）感受和治療師的建議，對諮商服務的滿意度較低。Paone 和 Malott (2008) 同樣指出諮商師和當事人之間的語言落差，會對諮商過程和結果產生很多負面影響。這些負面影響包括個案的提前結束 (Sue, 1991)、影響診斷的正確性 (Bamford, 1991)、影響個案表達問題的類型和深度 (Santiago-Rivera, 1995; Seijo, Gomez, & Freidenberg, 1991)、個案回到並繼續接受諮商的意願 (Hillier, Loshak, Rahman, & Marks, 1994)。由上述可發現諮商情境中，諮商師缺少通譯員的協助、無法以當事人的第一語言提供服務時，對當事人諮商感受與成效有很大的差異，可見通譯員在多元文化諮商實務工作中的迫切性與重要性。

台灣最近二十多年，非中華民國國籍的外籍勞工和外籍配偶人口越來越多，根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101 年 7 月份的統計數字，在台從事產業及社福相關工作的外籍勞工人數高達 441,507 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2012），另外目前在台逃逸行蹤不明的外勞人數高達 37,285 人（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移民署]，2012），外籍勞工來台工作，雖然使勞動方面的供應更加充足與多元化，但也因為語言障礙、文化和風俗習慣的不同而產生適應上的問題，進而可能導致犯罪和逃逸的情形；外籍配偶（不含大陸）的人口數也高達 152,313 人（移民署，2012），

其中從 98 至 100 年遭遇婚姻暴力的外籍配偶人數高達 10,732 人（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2011）。楊明仁、施春華、鄭夙芬、何啓恭、陳順勝（1999）研究指出，外籍配偶來台乃是希望能藉由婚姻來改善家鄉的經濟狀況，夫妻雙方缺乏感情基礎，對於婚姻的期許與現實間的差距往往造成衝擊與影響。外籍勞工與外籍配偶遠離家鄉，失去原有的社會支持，置身於完全陌生的情境脈絡中，若遭遇困難缺少可傾吐的對象，則對於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影響。在眾多影響新移民心理健康的因素中，語言隔閡與溝通困難常被視為主要的危險因子（Thompson, Hartel, Manderson, Woelz-Stirling, & Kelaher, 2002），在台灣他們可能會說一些台灣社會常用的語言，有一部份的人則不會台灣社會的語言就來台灣工作或嫁到台灣。當這些外籍勞工或新移民在台灣所碰到的困難愈來愈複雜，需要提供服務的種類也愈趨多元，他們所需要的協助，可能不只是法律協助、經濟補助、醫療提供、工作介紹等，在某些程度上亦需要專業心理諮商，此時，通譯員在心理諮商的情境，就扮演著特殊且關鍵的角色，在兩個不同語言個體之間，擔任重要的溝通橋樑（Fradd & Wilen, 1990）；然而，國內在這一方面的訓練和研究相當貧乏。

因此，研究者認為在台灣外籍勞工和外籍配偶人數逐年增加，心理健康問題和需求逐漸嚴重的情況下，通譯員在心理諮商服務的提供上，具有某種程度的重要性，也顯現諮商師和通譯員在心理諮商情境，將會有合作上的問題和挑戰。

參、諮商師、當事人和通譯員的三角關係

傳統一對一的諮商情境乃是「一位受過專業訓練的諮商師和一位因困擾而求助的當事人」，其諮商中的關係和互動已經充滿複雜性。如果再加上通譯員在場，包括諮商師和當事人、諮商師與通譯員，通譯員和當事人等三角關係將更是複雜，對於諮商的過程和效果都有其重要的影響（Farooq & Fear, 2003）。這種新的諮商情境和關係，跳脫傳統諮商師的訓練，值得大家所重視和關注。因此，研究者根據相關國外文獻（Goh, Dunnigan, & Schuchman, 2004; Miller, Martell, Pazdoret, Caruth, & Lopez, 2005; Paone & Malott, 2008; Raval, 1996; Rechtman, 1997; Tribe, 1998），將這種新的三角關係諮商情境及其對諮商的影響整理如下：

一、對諮商的正面影響

- （一）透過通譯員的協助，在諮商過程中幫助當事人表達其複雜的情感和想法，可以減低當事人的孤獨感；甚至，通譯員可以幫助諮商師了解當事人的文化和文化所影響的行為，以減少文化上的代溝（Goh et al., 2004; Rechtman, 1997; Tribe, 1998）。
- （二）如果通譯員能夠適當且正確地扮演他在諮商情境中的角色，將會對諮商過程和效果產生很多正面的影響，例如：可以增進個案的歸屬感，以及對諮商師和諮商過程的信任（Miller et al., 2005）。

二、對諮商的負面影響

- (一) 通譯員在諮商過程逐漸增加投入，諮商師會覺得自己和治療過程有隔閡。起初個案與通譯員的關係會引發諮商師對通譯員的排斥和不確定之感受，甚至出現競爭的情形，尤其當通譯員和當事人形成強烈且支持性的關係時，諮商師發現這種關係會對諮商師產生階段性的排外感覺（*periodic feelings of exclusion*; Miller et al., 2005）。另外，Farooq 和 Fear (2003) 也指出當通譯員超出他們主要的口譯工作時，在諮商過程中會將諮商師降為旁觀者的角色，導致角色的模糊；這種情況常常發生在通譯員和當事人之前已建立關係，也會影響專業諮商關係建立和諮商成效。
- (二) 會影響諮商的進度而變慢。諮商師會收到通譯員要求，需要說得更直接和更簡單一些 (Raval, 1996)。
- (三) 如果諮商師在事前沒有與通譯員充分的溝通，會造成諮商師的擔心和害怕，並且認為通譯員會對諮商師的諮商能力「品頭論足」一番 (Paone & Malott, 2008)。
- (四) 若通譯員的個人議題，未妥善處理過且身處在具有相當情緒狀態的諮商情境，其過去創傷、分離、失落的故事，可能會在諮商過程中被挑起，影響通譯員當下的口譯工作，進而干擾諮商進展和成效 (Miller et al., 2005)。

因此，Whitsett (2008) 在心理衛生機構與通譯員的工作合作實務，提出：要清楚地界定口譯者和心理衛生服務提供者雙方的角色，並且有充分的溝通，以避免關係的混淆影響了諮商的效果。

肆、通譯員的身份與訓練

Lopez (2002) 指出通譯員的訓練是一項專業的訓練，需要即時翻譯雙方所說的話，即必須要同一時間聆聽說話者的內容、瞭解意思，並轉換另一種語言以傳遞給聽話者，這是一件困難的事。Farooq 和 Fear (2003) 也指出口譯是比一字一句翻譯還要複雜的過程，因為需同時解碼兩種語言，而每一種語言又有自己的地理、文化、歷史和傳統方言。即使受過專業訓練的通譯員有時也會翻譯錯誤，那麼，誰適合在諮商境中擔任通譯員呢？

一、通譯員的身份

目前通譯員來源大多是機構人員、社工或個案的家人、朋友、同鄉，這些人可能缺乏專業訓練、翻譯經驗有限、不瞭解諮商專業，而影響諮商進行和成效；他們協助諮商進行時，也可能會違反保密規定，尤其在家人擔任翻譯角色時，個

案可能會因為家庭忠誠度或家庭權力不同，而隱藏一些重要訊息，甚至放大錯誤 (Farooq & Fear, 2003; Paone & Malott, 2008)。Fusick (2008) 也認為諮商中使用通譯員時，家人和朋友不適宜擔任之，因為雙重關係會導致可能的衝突和保密問題。

因此，在諮商中使用通譯員時，宜避免是當事人的家人、朋友或社區居民，最好是當事人不認識、與機構有合作關係的人員來擔任，以避免雙重關係可能妨礙諮商的進行和效果。

二、通譯員的訓練

Miller 等人 (2005) 指出目前在臨床治療與諮商情境中，鮮少可提供口譯資源，基礎口譯訓練也相當缺乏，雖然通譯員接受翻譯雙方話語的訓練有必要性，但是接受完善口譯訓練者的比率並不高。另外，Miller 等人 (2005) 認為即使通譯員接受正式的訓練，但若其訓練模式偏向醫療或法律等工作的翻譯，將所學運用在諮商情境時會產生問題，特別是在諮商情境的口譯工作需要長期參與、在諮商過程中會出現很多起伏情緒，通譯員需要熟悉心理治療的背景知識與脈絡。因此，針對在諮商情境通譯員的招募與培訓，仍需注意許多心理治療的核心特質，如：高度同理心、良好的人際關係、高層次思考等，且需注意通譯員本身是否有相同的創傷，若通譯員本身有類似的議題未處理，也會影響治療與諮商的進行；反之，若通譯員對自己的議題有良好的處理，將對治療有所助益。

Lopez 和 Rooney (1997) 調查通譯員的工作內容和專業程度時發現，在紐約州 89 位通譯員中，總共使用 29 種語言，其中西班牙語 (32%) 為通譯員工作中使用最多的語言；另外，通譯員中有 94% 為兼職，只有 30% 受過正式的口譯訓練，他們為學校中的諮商師、社工師、心理學家、老師和行政人員工作。此外，通譯員也必須具備某些專業領域的背景知識，例如：在精神醫療情境中、在早療情境中、在失聰情境中，通譯員進行翻譯時就需要具備該領域的知識，以使能夠正確傳遞雙方的意思 (Fusick, 2008; Guthmann, 2000; Marcos, 1997; Paone & Malott, 2008; Whitsett, 2008)。Paone 和 Malott (2008) 更指出通譯員必須要對相關背景知識有所瞭解 (contextual knowledge)，包括相關組織文化和政策的知識，例如：在學校機構，通譯員需要瞭解學校對藥物濫用、未婚懷孕等政策。

另外，文化的敏銳度也是一項重要的訓練，Sue 和 Sue (2008) 即指出通譯員對當事人本身文化脈絡的瞭解，諸如文化影響的對話方式和語彙使用，應有一些敏銳度；例如 Langdon 和 Cheng (2002) 認為某些俚語 (如：早起鳥兒有蟲吃)、情緒的隱藏成分 (emotional undertones，如：驚恐的表達 [the use of sarcasm])、幽默等，在不同文化間的表達和知覺具有差異。

綜合上述，通譯員與諮商師在諮商服務中所應具備的能力，除了個人本身的人格特質外，個人議題的覺察和適度處理也很重要，另外，針對諮商服務的特性、內容、方式、目的及相關的法令規章等知識亦需具備，才能在諮商情境中與諮商師有良好的合作搭配、提供有效的諮商服務。

伍、諮商師和通譯員在心理諮商的合作

各領域助人專業「合作」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但是這些領域大多是屬於非諮商情境中的合作，舉凡家庭暴力、性侵害、未婚青少年懷孕的防治工作，涵概了社政、司法、醫療、警政等不同專業領域在諮商情境外的合作。諮商師和通譯員在心理諮商服務情境的合作，在台灣鮮少碰到且很少討論。因此，研究者引用外國的文獻、個人與通譯員在諮商實務工作經驗的反思，提供國內諮商師和通譯員在心理諮商合作上的參考。

一、在進行諮商前：機構、諮商師與通譯員三方面的事前溝通

目前國內在助人網絡中，使用通譯員的場合大多在醫院、法院協助翻譯的工作，鮮少在諮商服務上與諮商師合作來提供服務給當事人，不僅是諮商師沒有類似的合作經驗，對於通譯員也是如此，因此，機構人員需要告知諮商師有需要搭配通譯員進行諮商的當事人，並應尋求適當的通譯員；Paone 和 Malott (2008) 特別談到媒合當事人和通譯員的性別、文化、年齡等相關條件的重要性，Whitsett (2008) 則提出機構要使用受過訓練的通譯員，而不只是具備雙語能力的工作人員或社區居民。機構人員更需要向通譯員說明心理諮商服務的特性（保密規定、每週一次的持續諮商，最好不要臨時更換通譯員、翻譯費用等）、諮商師和通譯員在諮商中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合作過程可能碰到的問題與解決方式等。

諮商師也應於事前與通譯員進行討論和溝通，包括在諮商中如何介紹自己和通譯員、位置的安排（如：諮商師和通譯員要坐在同一側，且通譯員要稍為在諮商師後面一些，最好不要在諮商師和當事人中間或是與當事人坐在同一側）、口譯的程序或是說話的規則（如：碰到話語太長、速度太快、話語艱澀難懂或模糊、無法翻譯時的處理方式）、提供當事人基本資料和問題脈絡等。通譯員也可以提供當事人所成長的文化脈絡、風俗民情、生活習慣、信仰價值等資訊，讓諮商師和當事人減少文化上的代溝 (Goh et al., 2004; Rechtman, 1997; Tribe, 1998)。

二、在晤談過程中

在進入晤談前，諮商師需要與通譯員討論本次諮商的方向和目標 (Farooq & Fear, 2003; Paone & Malott, 2008)，並再次確認彼此的角色和職責，以及口譯程序或互動規則，以利諮商的順利進行。

在開始晤談時，諮商師需要主動介紹自己和通譯員，並說明通譯員的角色 (Paone & Malott, 2008)，並對當事人和通譯員進行諮商的場面構成、詢問當事人的狀況及回答當事人對諮商服務的疑問。Farooq 和 Fear (2003)、Paone 和 Malott (2008) 都提醒諮商師說話要放慢速度且清楚，使用簡單、簡短且一般人能了解

的詞句，避免使用隱喻、俚語或專業術語等，以利通譯員能夠正確翻譯諮商師的訊息。另外，研究者的實務經驗則是要注意通譯員翻譯的情形，例如：諮商師可能只講一個詞句，通譯員卻說了一大串、通譯員的面部表情出現疑惑或通譯員的口語表達出現停頓和不順暢；這些反應都有可能是通譯員對諮商師所傳遞的訊息不清楚、無法翻譯或通譯員本身狀況，而影響翻譯進行的順暢度。

因此，學者們都建議諮商師和通譯員都需要多加練習，並培養合作的默契和合作的團隊 (Farooq & Fear, 2003; Paone & Malott, 2008; Whitsett, 2008)。

三、在晤談結束後

諮商師在結束當次晤談後，最好留一些時間討論當次晤談的狀況，尤其是有關通譯員對於當事人的情緒反應，因為大多通譯員和當事人是同鄉，例如越南、印尼、菲律賓等。通譯員在晤談過程中，聽到當事人離鄉背井在台灣生活的悲慘過程，是否會因為與當事人的關係或聯想到自己本身的經歷而產生一些強烈的情緒反應，影響了通譯員的日常生活或是下次的晤談；因此，Whitsett (2008) 建議若這種情形發生，機構和諮商師要妥善處理通譯員的情緒和個人議題，以利通譯員在諮商服務過程中能夠發揮其應有的角色和功能。

此外，諮商師應與通譯員討論：在晤談過程中，通譯員在其翻譯協助的過程中是否遭遇困難，包括詞句翻譯的困難度、需要做語言的修改或省略動作 (Baxte & Cheng, 1996)、不同文化的差異行為之詮釋（例如：中秋節在華人世界是一個團聚的日子，但是對其他人並不是；早起鳥兒有蟲吃、幽默行為的使用）(Langdon & Cheng, 2002)，以及在晤談過程會干擾通譯員發揮功能的事情，都可以利用時間來加以討論，有助於日後的繼續合作。

綜上所述，諮商情境中諮商師與通譯員之合作，在諮商進行前、中、後諮商師與通譯員皆須進行協調和溝通，協助通譯員了解自身在諮商過程中所扮演之角色與注意事項等，使其能更快投入於晤談中，發揮口譯之效能，且能在每次溝通中減少彼此之不確定感，增加合作之默契。

陸、結語

語言是多數進行心理諮商的主要工具，共通且常用的語言將有助於諮商師和當事人的有效溝通、增進諮商效果。然而，台灣在外籍勞工及外籍配偶政策的改變，促使台灣人口的組成越來越多元，這些進入臺灣社會的外勞或新移民，他們所面臨的問題將越來越多元和複雜，不僅需要法律、醫療方面的協助，可能更需要心理諮商的服務，以增進其生活的適應力和身心健康。因此，諮商師在提供心理諮商專業服務過程中，將會有更多的機會與需要，與通譯員進行合作，不僅諮商師需要打破習慣於一對一的傳統諮商習慣，更需要學習與通譯員合作，以提供有效的諮商服務。

參考文獻

-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移民署] (2012)。統計資料。取自
<http://www.immigration.gov.tw/ct.asp?xItem=1136548&ctNode=29699&mp=1>
-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2012)。外勞人數統計。取自
http://www.evta.gov.tw/content/list.asp?mfunc_id=14&func_id=57
-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2011)。98 至 100 年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被害人籍別與案件類型統計。取自 <http://dspc.moi.gov.tw/ct.asp?xItem=2917&ctNode=776&mp=1>
- 楊明仁、施春華、鄭夙芬、何啓恭、陳順勝 (1999)。在台外籍勞工之適應困擾探討。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2 (1)，93-107。
- Bamford, K. W. (1991). Bilingual issues in mental health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Hispanic Journal of Behavioral Sciences*, 13, 377-390.
- Baxter, H., & Cheng, L. Y. (1996). Use of interpreters in individual psychotherapy.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30, 153-156.
- Farooq, S., & Fear, C. (2003). Working through interpreters. *Advances in Psychiatric Treatment*, 9, 104-109.
- Fradd, S., & Wilen, D. (1990). Using interpreters and transators to meet the needs of handicapped language minority students and their families. *NCBE Program Information Guide Series*, 4.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 332540)
- Fusick, L. (2008). Serving client with hearing loss: Best practice in mental health counseling.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86(1), 102-110.
- Goh, M., Dunnigan, T., & Schuchman, K. M. (2004). Bias in counseling Hmong clients with limited English proficiency. In J. L. Chin (Ed.), *The psychology of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 vol. 2, Ethnicity and multiracial identity* (pp. 109-136). Westport, CT: Praeger.
- Guthmann, D. (2000). *Identifying and assessing substance problems with deaf deafened, and hard of hearing individuals*. Retrieved from ERIC database. (ED 452-650).
- Hillier, S., Loshak, R., Rahman, S., & Marks, F. (1994). An evaluation of child psychiatric services for Bangladeshi parents.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3, 327-337.
- Kline, F., Acosta, F. X., Austin, W., & Johnson, R. G. (1980). The misunderstood Spanish-speaking pati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7, 1530-1533.
- Langdon, H. W., & Cheng, L. L. (2002). *Collaborating with interpreters and translators: A guide for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professional*. Eau Claire, WI:

Thinking Publications.

- Lopez, E. C. (2002). Best practices in working with school interpreters to deliver psychological services to children and families. In A Thomas & J. Grimes (Eds.), *Best practices in school psychology IV* (pp. 1419-1532).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 Psychologists.
- Lopez, E. C., & Rooney, M. E. (1997).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the roles and backgrounds of school interpreters: Implications for training and recruiting. *Journal of Social Distress and the Homeless, 6*, 161-174.
- Marcos, L. R. (1997). Effects of interpreters on the evaluation of psychopathology in non-English-speaking cli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6*, 171-174.
- Miller, K. F., Martell, Z. L., Pazdirek, L., Garuth, M., & Lopez, D. (2005). The role of interpreters in psychotherapy with refugee: An exploratory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75*(1), 27-39.
- Paone, T. R., & Malott, K. M. (2008). Using interpreters in mental health counseling: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commendations.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36*, 130-142.
- Raval, H. (1996). A systemic perspective on working with interpreters.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1*, 29-43.
- Rechtman, R. (1997). Transcultural psychotherapy with Cambodian refugees in Paris. *Transcultural Psychiatry, 34*, 359-375.
- Santiago-Rivera, A. L. (1995). Developing a culturally sensitive treatment modality for bilingual Spanish-speaking clients: Incorporat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counseling.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74*, 12-17.
- Seijo, R., Gomez, H., & Freidenberg, J. (1991). Language as a communication barrier in medical care for Hispanic patients. *Hispanic Journal of Behavioral Sciences, 13*, 363-376.
- Sue, D. W., & Sue, D. (2008). *Counseling the culturally diverse (5th ed.)*. Hoboken, NJ: Wiley.
- Sue, S. (1991). Ethnicity and culture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J. Goodchilds (E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human diversity in American* (pp. 51-85).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Thompson, S., Hartel, G., Manderson, L., Woelz-Stirling, N. & Kelaher, M. (2002).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Filipinas in Queensland.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36*, 674-680.
- Tribe, R. (1998). A review of a support and clinical supervision group for interpreters working with refugees in Britain. *Group Work Journal, 10*, 196-214.
- Whitsett, M. (2008). *Tips for mental health interpretation*.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Health and Health Care in Schools.

Counselor and Interpreter Collaboration in Counseling Service

Jinn-Nan Hwang* Shin-Ting Kuo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issues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counselors and interpreters in counseling services. Using literature review, this study underscored the importance of using interpreters and translators when providing counseling services to foreign workers and new immigrants in Taiwan, and recommended that counseling training organizations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put more emphasis on this issue.

This paper includes discussions on the following issues:

1. the importance of interpreters in cross-language counseling;
2.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involving the client, counselor, and interpreters;
3. the identity and necessary training of interpreters,
4. suggestions for counselors and interpreters in counseling cooperation.

Keywords: counselor, interpreter, collaboration

Jinn-Nan Hwang*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Fortun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nnan@center.fotech.edu.tw)

Shin-Ting Kuo Dept. of Edu. Psy. & Counseling,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